

載於譚少薇, 葉漢明, 黃慧貞 及 盧家詠(2012)(編)。性別覺醒: 兩岸三地社會性別研究 (頁 236-255)。香港: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尊嚴與朋輩的失落： 香港男性的貧窮處境

黃洪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助理教授

論文摘要

貧窮不單在第三世界的農村出現，更存在於各國家大城市之中。香港的勞動階層與全球各地的勞動者一樣，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在九十年代出現貧窮迅速惡化的問題。香港可能被視為經已脫離貧窮，但貧窮事實上從未脫離香港。

而貧窮人口中的中年男性多是以前從事製造業及建造業的工作，面對經濟轉型，他們不但面對失業減薪的經濟困境，更重要的是他們失去了自尊自信，亦失去了工友間的社會網絡。失業的男性出現家庭問題及社會孤立的情況亦愈來愈嚴重。

本文總結筆者近年對香港貧窮人士、邊緣勞工以及露宿者的研究，對香港的貧窮男性，作出性別與階級角度的剖析。貧窮戶的社會網絡中亦以無業人士居多，社會網絡出現同質化的情況。沒有工作及屬不固定工作人士的社會網絡的規模亦明顯少於有固定工作的人士，其社會網絡亦出現同質化，而無業或工作不穩定對男性造成同質化的影響較女性大。

關鍵詞： 貧窮， 男性， 社會資本， 尊嚴

背景

香港貧窮狀況

貧窮不單在第三世界的農村出現，更存在於各國家大城市之中。香港的勞動階層與全球各地的勞動者一樣，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在九十年代出現貧窮迅速惡化的問題。香港可能被視為經已脫離貧窮，但貧窮事實上從未脫離香港。¹

香港的貧窮及貧富懸殊問題日益嚴重。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後，香港的經濟持續下滑，在二零零二年五至七月香港的失業率高達 7.8%，有二十七萬五千人失業。香港的實質平均薪金指數由 1999 年的第一季的 100 下降至 2002 年第三季的 98.6，顯示香港僱員的收入實質下降。2001 年人口統計普查顯示，香港堅尼系數由 1981 年 0.451 持續上升至 2001 年有紀錄以來最高的 0.525，亦表明香港的收入分佈愈來愈走向不平均。²

貧窮人口中的中年男性多是以前從事製造業及建造業的工作，面對經濟轉型，他們不但面對失業減薪的經濟困境，更重要的是他們失去了自尊自信，亦失去了工友間的社會網絡。失業的男性出現家庭問題及社會孤立的情況亦愈來愈嚴重。面對社會資本消失，以及被社會排斥的處境，不少貧窮男性無論在社會地位、經濟收入以至家庭關係每況愈下，造成種種的社會問題。

理論視角

社會資本

從個人或微觀的角度出發，社會資本是指個人透過與他人的社會聯繫（social tie）而獲得的經濟資源、資訊或機會。從社會、團體組織或宏觀的角度出發，社會資本指一個社會或組織透過組織之間或社會中的規範、網絡與信任來促進集體行動去實現共同利益。³Putnam 認為，一個人的社會資本可以從他/她所擁有的社群網路來描述和量度。故此社會資本是指借助於所佔據的社會關係網絡而把握的資源、財富、資訊或機會。⁴一個人的社會資本愈多，能動員的資源就愈多，在生活和工作上解決問題的能力就更強。社會資本源自人際關係是集體性的，亦會因為人際關係的破壞而消失。⁵

Wilson 詳細分析失業問題嚴重如何令芝加哥市中的舊城區愈來愈破落，而成為貧民窟。⁶Wilson 指出黑人貧民社區中的中產階級往郊區外移，令貧窮社區中缺乏傳播價值、模範、及資訊的組織。失業人士及其家庭缺少收入，多依靠社會福利為生，所以並沒有多餘的開支去作閒暇及社會參與的活動，再加上少數族裔及弱勢社群所面對社會的歧視及排斥，令失業人士較難與其他社群接觸及聯絡，造成其處於封閉及同質的網絡中。所以失業問題惡化與社會資本的弱化可理解為互為因果，變成惡性循環 (Rankin & Quane, 2000)。⁷

社會資本很多時不是靠強聯繫(strong tie)的動員，而是倚賴和較陌生的人建立聯繫及結連不同的弱聯繫(weak tie)的力量。通常，人不只與單一社會網絡有關，而會同時與多個社會網絡有聯繫。參與社會的層面越多，那人就會有較多的弱聯繫網絡，而且這些網絡性質重複的機會就越小。網絡群越不重複，可獲取的資訊和資源也較多樣化，故此那人擁有越高的解決問題能力。

Granovetter (1981)指出由僱員介紹會更可靠而不重覆網絡的弱聯繫(weak ties)，在介

紹工作比同質的強聯繫來得更重要。失業人士的社會資本的弱化，令他們與在職人士的社會聯繫減少，因而亦令他們難於進入勞動力市場。

Paugam (1999)根據法國的經驗指出則指出貧窮人士被迫生活於孤立之中。窮人為了嘗試掩蓋本身的不幸，對於那些可能接近他們的人保持較疏遠的關係。他們令人羞恥的生活狀況令他們認為自己並不屬於任可的階級。Paugam 指出法國的失業人士很多時對於直接家人之外的親屬都會保持疏遠的關係。而職業生涯愈不穩定，家庭關係可能就根本不存在。男性比女性對這孤立的現象更敏感以及更易於內化。這解釋了現時廣泛存在於高失業率的社區中的社會網絡解體的現象。而有關分析亦可以作為理解香港貧窮男性的處境的視角。

香港社會資本的變化

在六、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時，百業興盛，尤其是製造業、服務業和非正規經濟均有長足的發展。在製造業和服務業中的工人透過建立行業性的人際網絡，創造自身的社會資本，從而獲取資訊和資源，增加額外的經濟利益。這些行業性網絡通常於工作間或工作的地區建立。

而在非正規經濟(informal economy)部門，市場集結地 (marketplace) 成為地域性生活網絡建立的場所。非正規經濟部門的網絡協助成員有效及靈活地集結資訊和資源去創造經營和生存空間。這種低下層在日常生活中建立的以鄰里、街坊、工友、或小老板組成的地域性生活網絡，為勞工提供著社會資本(如介紹工作、交換勞動市場的訊息)，令勞工避免下滑至勞動市場的底層。社區作為聚集的空間成為創造社會資本的基本條件。

黃洪及李劍明(2001)對邊緣勞工的質性研究指出自八十年代中期，香港出現經濟轉型和去工業化、導至行業性網絡弱化。不少行業的經濟活動不斷退縮。在沒有經濟活動的支持下，原本行業網絡所發揮的節省交易成本作用也沒有必要。當然行業網絡不會單單因為失去經濟功能而消失，它還會發揮感情支援和社交作用。但失去經濟活動意味著工作間不復存在，再不能提供原有的聚集功能，使網絡逐漸瓦解或因資訊及資源萎縮而失去其支援能力。當整個行業受到打擊時，同質的網絡原本可以發揮互相支援的作用亦弱化。在行業不景時，成員資訊和資源一同縮減，大大弱化透過網絡集體地解決個別成員問題的能力，亦即是面對社會資本的消失。

政府新市鎮的城市規劃政策及市區重建政策，令舊區土地成為賺錢的商品，舊區空間的變遷既改變了原來舊區的經濟活動，亦瓦解了勞工過去在原區建立多年的生活及工作網絡，令他們的生存空間愈來愈少。大型連鎖店及超級市場的興起亦威脅非正規經濟的生存。貧窮人士社會資本累積所依托的舊市區空間以及非正規經濟的活動受到嚴重的擠壓，面對雙重的打擊。

在缺乏物質及人力資本下，家庭社會資本成為貧窮人士的唯一倚靠。不少貧窮人士就是靠家庭社會資本來維持生活。但家庭核心化、單親家庭的增加令家庭網絡弱化亦把貧窮人士最後所能倚靠的家庭社會資本削弱。

有較大接觸網絡的人，和網絡較小的人們比起來，更能佔有獲取較高資訊和解決問題能力。可是人們會跟喜歡自己相似的人發展關係，因為社會條件相似的人們有較多共同的利益，關係就比較持續。在人際網絡篩選與重組的過程中，人們持續投資情緒、情感，來強化彼此的信任基礎及交易穩定性。其和街坊、朋友的交易網絡被轉化為教導、關心、分享的社會關係；上下線之間的利益聯繫被改造成相對封閉的和同質的「仿家庭衍生網絡」。

黃及李進一步指出負面社會定型所產生的社會排斥正阻礙被排斥者透過社交活動去建立異質不重複網絡，從而失去創造社會資本的機會。被排斥的弱勢人士便容易處於上述同質化的「仿家庭衍生網絡」中。上述分析連繫了貧窮、社會排斥與社會資本的關係。

定量分析：朋輩的失落

香港貧窮線研究(2001)

研究介紹

香港貧窮線研究之主要目的是了解這些家庭的開支模式及生活狀況制訂香港的貧窮線；而研究亦會分析貧窮戶的特色、消費模式、生活狀況及社會網絡的情況。在生活狀況及社會網絡的部分，我們嘗試量度被訪者「社會排斥」及「社會資本」，有半數即1,502個被訪者接受了這部份的訪問。以下分析便是利用這部份的數據集中比較不同工作狀況人士「社會資本」的規模及性質，亦分析性別的影響。

不同工作狀況人士的比較

表 1: 不同工作狀況人士的社會網絡規模

	沒有工作 (組別 0)	散工及不固 定工作 (組別 1)	固定工作 (組別 2)	ANOVA/ Posthoc (LSD)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有多少個親友可以 借錢給你?	1.71 (8.11)	1.71 (2.73)	2.61 (5.54)	F=2.911 d.f.=2 p>0.05 0/1 n.s 0/2 p<0.05 1/2 n.s.
有多少個親友可以 介紹工作給你?	1.13 (2.57)	2.56 (4.50)	2.45 (6.49)	F=16.866 d.f.=2 p<0.01 0/1 p<0.01 0/2 p<0.01 1/2 n.s.
你有多少個可以信 任的親友?	2.82 (8.37)	2.98 (3.53)	4.33 (7.07)	F=6.603 d.f.=2 p<0.01 0/1 n.s. 0/2 p<0.01 1/2 p<0.05
社會資本指數總計	5.65 (17.43)	7.21 (8.13)	9.42 (15.80)	F=8.864, d.f. =2, p<0.01
(N)	818	179	505	1502

我們比較不同工作狀況的人士社會網絡的規模，發覺沒有工作及屬散工及不固定工作人士的社會網絡的規模明顯少於有固定工作的人士(參看表 1)。沒有工作及屬散工及不固定工作人士可借錢親友的平均數目同是 1.71 人，少於固定工作人士的 2.61 人，經 LSD posthoc 分析組際差異後，發現沒有工作與固定工作的差別顯著 ($p<0.05$)，但其他組合的差別則不顯著。這顯示固定工作比沒有工作的人士有更大的經濟支援網絡。

在介紹工作的網絡方面，沒有工作人士這方面的規模最少，平均只有 1.13 人，明顯少於屬散工及不固定工作人士的 2.56 人及有固定工作人士的 2.45 人，差別顯著 ($F=16.854$, $p<0.01$)。經 LSD posthoc 分析組際差異後，發現沒有工作與散工及不固定工作，以及沒有工作及固定工作的差別均顯著 ($p<0.05$)，而屬散工及不固定工作人士與有固定工作人士的差別則不顯著。這顯示沒有工作人士的尋找工作網絡明顯比有工作(包括固定工作或不固定工作)人士的規模少。

有固定工作人士可信任的親友網絡的規模最大(4.33 人)，明顯地優勝於沒有工作

(2.82 人)及散工、不固定工作人士(2.98 人) ($F=6.603, p<0.01$)。經 LSD posthoc 分析組際差異後，發現有工作與散工及不固定工作，以及有工作及固定工作的差別均顯著 ($p<0.01$)，而沒有工作與散工及不固定工作的差別則不顯著。這顯示有固定工作人士的可信任網絡的規模明顯比沒有固定工作成(包括沒有工作及不固定工作)人士的規模大。以三組社會網絡組成的社會資本指數計，沒有工作的社會資本是指數是 5.65，明顯較散工及不固定工作的 7.21 及固定工作的 9.42 為低。

社會網絡的同質化

被訪者的工作狀況對其社會網絡同質化有明顯的關係。我們發現被訪者本身沒有工作以及屬散工及不固定工作人士其親悉的親友中無業的比例比固定工作人士較多。有 33.7% 散工及不固定工作的人士表示在熟悉的親友中無業比在業「多很多」及「多」。而沒有工作人士，兩者合共是 31.1%。散工及不固定工作人士的網絡中以無業人士為主的情況略高於沒有工作人士，這與一般的估計有差別，我們曾經控制年齡、教育水平及是否在港出生等三項因素，但仍出現散工及不固定工作人士的社會網絡同質化較沒有工作人士嚴重的情況，但在控制性別因素，有關情況並未出現，所以我們確認出現上述情況是由於性別因素對工作類別及網絡同質的影響。

露宿者服務評估研究(2002-2004)

在 2000 年露宿者出現年青化、多元化、短期化及深宵化的發展趨勢，促成了深宵露宿者服務的設立，黃洪、李昺偉及孫玉傑(2004)接受社會福利署的委託進行研究以評估新服務的成效。新服務的開展建基於露宿者問題非單純是個人條件的限制，而是源於一個更深層的社會環境的因素中來考慮。我們假定「社會聯繫薄弱」和「缺乏社會支援」是露宿者困局的核心部份，露宿者絕大部份問題源起於失業和個人支持網絡的脆弱，形成被勞動市場排斥(exclusion from labour market)及家庭排斥(exclusion from family)的弱勢社群。

正因為就業(employment)對中年人生發展階段而言是極其重要，倘若中年失業形勢無法及早扭轉，其波及影響(spill-over effects)就會產生骨牌效應；例如壓力、家庭生活失調等負面影響會陸續出現。個人的調適機能(coping mechanism)會隨著角色迷失(rolelessness)及支持網絡的脆弱而對精神健康和社會聯繫失去生機(exclusion from wide aspects of well-being and social networks)，這正是短期露宿者需要及時介入，以免問題累積成為長期社會負擔，到時要扭轉長期露宿者問題的社會成本就更大了。由於露宿者中超過九成半是男性，所以是次研究的分析亦可以用於了解香港最貧窮及邊緣的男性的狀況和處境。

有關研究的基線問卷調查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五日晚上至十月八日凌晨進行。以了解全港露宿者的狀況，問卷採用面對面的方式進行，可供分析問卷共 298 份。成功率為 50.9%。露宿者性別方面，男性仍佔絕大部分，高達 97.6%，只有 2.3%被訪者為女性。學歷方面，高達八成半(84.1%)受訪者只有初中以下，其中 17.7%從未入學、46.1%學歷在小學或以下、20.3%有初中程度。另有一成(10.7%)有高中程度、1.8%預科，另有 3.3%學歷為大專或以上。可見受訪者學歷普遍偏低。有六成(59.1%)被訪者為單身人士，兩成三(23.0%)已婚，13.1%離婚，2.6%分居。而喪偶的則只有 1.5%，亦有 0.7%受訪者自稱與人同居。

量度工具

「精神健康指數量表」(index of well-being): 這是根據 Campell、Converse 及

Rodgers (1976)發展出來的精神健康指數量表。內容主要為了解被訪者對自己近期生活情況的主觀評鑑，從中可以測試個體的正面或負面感覺的水平。此量表由八項生活感覺指標(例：有趣 vs 沉悶；快樂 vs 痛苦等)組成一精神健康量表，在本地研究中曾被使用，發現其信度(reliability)頗高(馮偉華、孫玉傑，1997；Sun, Fung & Kwong, 2000)。而在是次研究的預測時發現一題目於本研究中信度偏低而刪減之(充實 vs 空虛)，量表信度亦達頗高的水平(Cronbach's alpha=0.8301)。

「社會聯繫量表」(index of social-tie)是研究員參考社會網絡量表特別為露宿者發展出的新量表，而在是次研究中量表的信度頗高(Cronbach's alpha=0.7805)。

「社會孤寂量表」(index of social loneliness)(楊中芳等，1997)本問卷調查中其信度為 0.6515(Cronbach's alpha=0.6515)。

「無家程度量表」(index of homelessness)是研究員發展的新量表，以量度露宿者的無家的程度，包括居所的環境、安全性及露宿者對居所的主觀感覺。信度為 0.8282(Cronbach's alpha=0.8282)達頗高水平。

「工作穩定量表」(index of job attachment)亦是研究員發展的新量表，以量度露宿者的工作穩定及對勞動力市場聯繫的程度，信度很高，達 0.8013(Cronbach's alpha=0.8013)。

社會聯繫及社會孤寂狀況

「社會聯繫」是指受訪者與朋友的接觸情況，同時了解受訪者在有需要時所得到援助的主觀評鑑。在被訪時，受訪者首先回答他在香港有沒有朋友，若然表示在香港有朋友時，將進一步接受訪問。首先會了解受訪者與朋友接觸的頻密程度，然後了解在有需要時有沒有得到一些實質的援助或資訊方面的提供。另外，亦會了解受訪者與親友關係的主觀評鑑，而社交活動及機構團體活動的參與情況也包括在社會聯繫的範圍內。

「社會孤寂」是指「人們領悟、體驗及評價其孤立和與他人缺乏溝通的狀態」(楊中芳等，1997)，而量表的主要內容由八項題目所組成，內容包括傾訴、交往、被幫助及被了解等情況。

社會聯繫

有三成多受訪者表示沒有朋友，顯示這些人士的支援資源非常貧乏，情況值得關

注。在本地一些研究裡，無論在學或在職人士的支援對象都是朋友，這表示露宿者在朋友網絡方面明顯較其他人士為差。

表 3: 有幾個朋友

	人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1-2個	35	19.6	19.6
3-5個	62	34.6	54.2
6-10個	37	20.7	74.9
11-20個	20	11.2	86.0
21個及以上	25	14.0	100.0
總數	179	100.0	

在「表示有朋友的」受訪者裡，約有二成左右的受訪者祇有一至兩位朋友，這些人士的支援網絡較貧乏。另外，表示有超過廿一位朋友的受訪者有一成四，這顯示他們的社會支持的資源頗豐富。約有五成的受訪者的朋友人數約三至十人，他們社會支持的資源屬於一般

在「表示有朋友的」受訪者裡，有一成五左右表示最近沒有與他們的朋友聯絡。受訪者與朋友見面的頻密程度有五成左右稱頻密或十分頻密、有兩成九左右的受訪者表示偶爾見面；另各有一成左右(9.9%)回應稀疏或十分稀疏，這兩成人士的情況值得關注。整體而言，在與朋友接觸的情況似乎比我們想像中好，估計受訪者是與露宿點附近街坊、店舖或其他露宿者結為朋友，所以與朋友聯繫度頗高。但研究員必須強調，在是次調查中有三成三左右的受訪者表示沒有朋友的，所以從整體的交友情況來看，其實露宿者的社會聯繫的資源並不理想。

表 4: 有多少個人一定會借錢給你

	人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0個	91	46.9	46.9
1-2個	52	26.8	73.7
3-5個	41	21.1	94.8
6-10個	7	3.6	98.5
11-20個	3	1.5	100.0
總數	194	100.0	

有關朋友能否提供經濟援助，有四成半左右的受訪者(46.9%)回應沒有朋友會借錢給

他，兩成半左右 (26.8%)有一至兩個、兩成(21.1%)有三至五個，3.6%有六至十個；亦有1.5%回應有十一個至二十個以上；中位數為一至兩個，所以整體而言會幫助他們的人不多，況且有接近一半的受訪者表示沒有人會借錢給他們，可能他們所認識的朋友中，經濟條件亦不太好，亦有可能是由於「長貧難顧」，過去多次向朋友借錢，令朋友不願再借。

表 5: 有多少個人會介紹工給你

	人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0個	103	60.9	60.9
1-2個	26	15.4	76.3
3-5個	26	15.4	91.7
6-10個	11	6.5	98.2
11-20個	3	1.8	100.0
總數	169	100.0	

至於介紹工作上，有六成以上(60.9%)回應沒有朋友可以介紹，顯示他們在這方法所得到的援助較少，一至兩個及有三至五個各有一成五左右(15.4%)，略多於半成(6.5%)表示有六至十個；只有 1.8%的受訪者回應有十一個以上。有關數目比可以借錢的朋友更少，可見露宿者的朋友網絡同質性強、面對同樣的失業狀況，而未能為其介紹工作，換句話說露宿者社群的社會資本較低，未能提供足夠的支援。

表 6: 有多少個你可以信得過的親友

	人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0個	89	47.3	47.3
1-2個	41	21.8	69.1
3-5個	35	18.6	87.8
6-10個	12	6.4	94.1
11-20個	8	4.3	98.4
21個及以上	3	1.6	100.0
總數	188	100.0	

而信得過的親友，有四成半以上(47.3%)回應沒有，顯示不少露宿者沒有可以相信得過的親友，情況值得關注。另外，兩成左右(21.8%)有一至兩個、一成八左右(18.6%)有三至五個，略多於半成(6.4%)有六至十個；亦有半成左右(5.9%)的受訪者回應有十一個或以上的親友是相信得過的。

表 7: 最熟悉的人處境比你

	人數	百分比
差/差不多	149	52.3
好	136	47.7
總數	285	100.0

有五成左右(52.3%)受訪者最熟悉的人處境與受訪者差不多甚至比較差，只有 47.7% 處境比受訪者好。可能連受訪者熟悉的人自己也沒有工作(如前估計可能同為露宿者)，所以他們熟識的人的處境亦不見得比受訪者好。

有接近七成（69.4%）受訪者沒有與親友作電話聯絡，顯示他們的關係疏離，很少接觸。有接近六成（57.5%）受訪者沒有與別人去飲茶或食飯，是否與他們的經濟條件有關呢，有待進一步探討，但這顯示露宿者缺乏一般香港人的社交生活。在過去一個月內，有接近五成的受訪者表示並沒有進行一般的交誼活動。這顯示他們的社交聯誼活動上比較貧乏。但相對上，這是有較多露宿者參與的社會交往的行為，顯示非正規的活動是其主要的社交途徑。有關福利機構/教會舉辦的活動/聚會參與，普遍的參與率明顯偏低，有八成以上(81.4%)表示沒有參與，而只有一成八左右（18.6%）表示有參與。這可能表示是次的受訪者與某些機構或團體的接觸差不多，亦可能顯示彼此的關係不太深或露宿者對正規有組織的活動感到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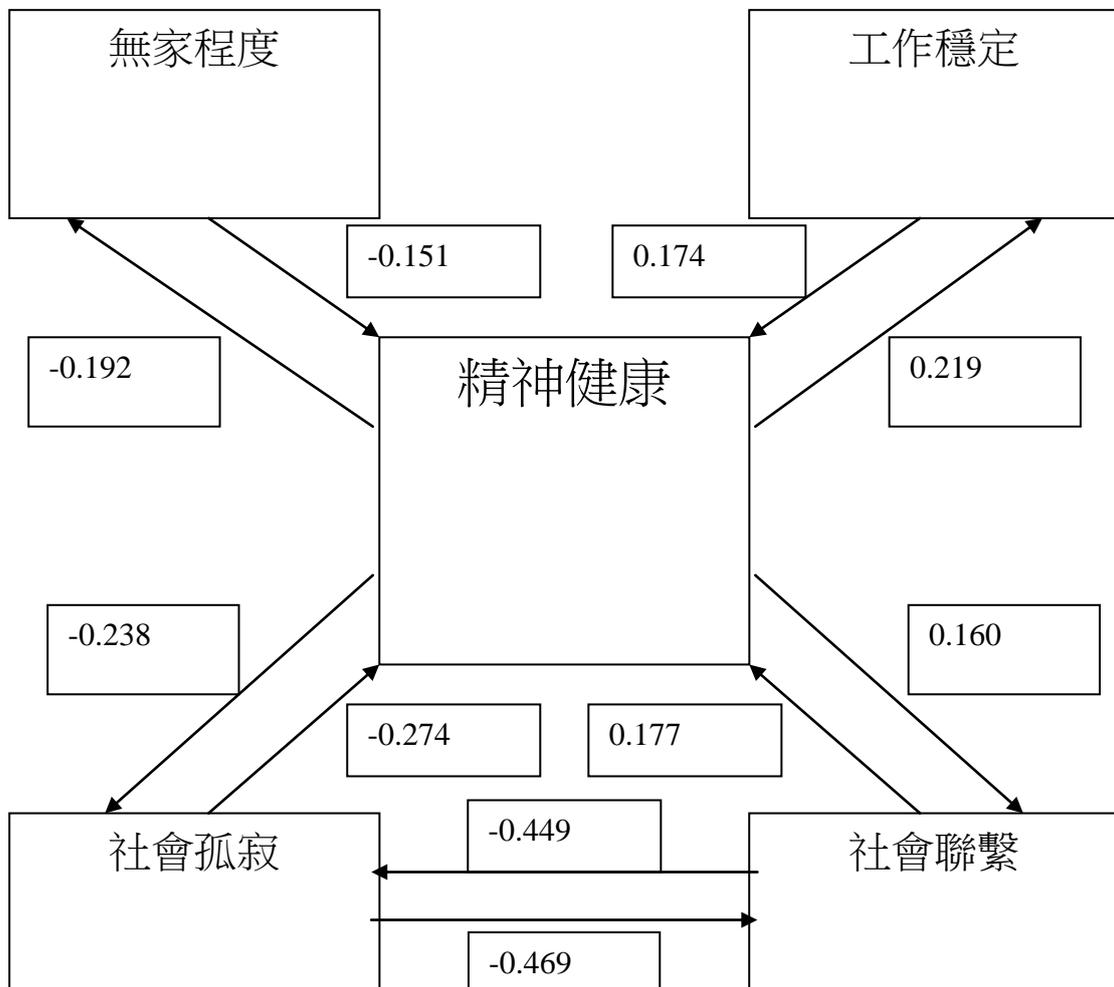
表 8: 社會孤寂量表

	否		是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L1. 好少人您可以同佢傾倒心事。	32.5	94	67.5	195
L2. 您得不到其他人對您的關心。	42.8	122	57.2	163
L3. 您可以搵到人傾日常生活的問題。	51.9	148	48.1	137
L4. 您覺得您太少朋友。	41.5	117	58.5	165
L5. 您覺得連自己最熟悉的人都唔了解您。	45.2	123	54.8	149
L6. 有需要的時候,您都可以得到朋友的盡力幫助。	53.9	151	46.1	129
L7. 有很多人可以接受您的性格。	36.2	97	63.8	171
L8. 您希望有真正講倒心事·朋友。	36.5	101	63.6	176

研究員發現，假若把「社會聯繫量表」及「社會孤寂量表」用統計學的方面把它們的數值加起來時，其信度係數明顯增加。故此，研究員在社會聯繫的分析上，將把上述兩個量表合併。以兩個量表綜合計算，受訪者的整體社會聯繫平均值為 1.44，中位數為 1.45。若果從「社會孤寂量表」裡的項目來分析，在傾訴心事、獲得關心、朋友數目、被人了解、獲得幫助等方面都有超過五成的受訪者呈現負面的情況，情況值得關注。研究員嘗試與本港一項老人研究（李昺偉、陳鑑銘，1998）作比較時，發現是次調查受訪者的孤寂感較長者為高。該項研究中，長者們孤寂感的平均分為 0.4959；而是以調查的受訪者為 0.5463。

不同時段各項指數的相互關係

圖 1:初接受服務各指數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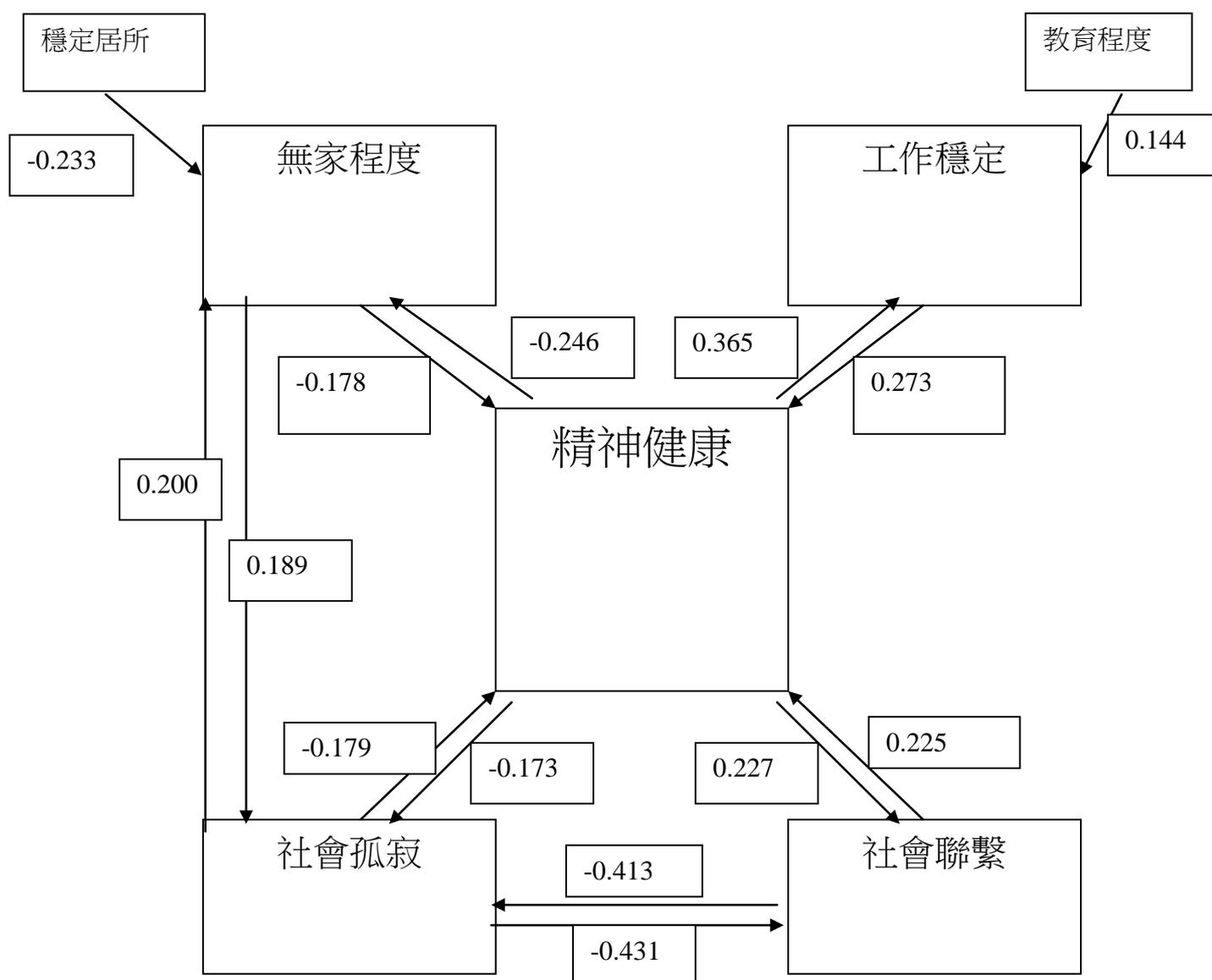


我們利用回歸分析法(linear regression)及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分析個案初接受服務(上樓後一星期)，五項指數之間的互為影響，發現社會孤寂、社會聯繫、無家程度及工作穩定四項指數均與精神健康有明顯關係($p < 0.05$)。對精神健康影響依次是社會孤寂(Beta=-0.274)、社會聯繫(Beta=0.177) 工作穩定(Beta=0.174)及無家程度(Beta=-0.151)。可見影響露宿者精神健康並不是單一因素，而是多項因素均有影響，其中在接受服務初期以受助人社會孤寂的影響最大，佔精神健康的變化差不多三成，而其他社會聯繫、工作穩定、及無家程度三項因素的影響力則相若。因此，要改善露宿者的精神健康，需要同時兼顧改善露宿者的社交的社會網絡、住屋環境的無家狀況、以及工作的穩定，而在上樓初期降低其孤寂感，重建其較親密的網絡及人際關係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其他社會聯繫、工作穩定、及無家程度三方面的介入亦不能偏廢。

從圖 1 中的影響圖中我們亦留意到，精神健康亦是露宿者各指標中最有影響力的因素，精神健康的改善均有助於對其他指標的改善。精神健康對其他四項指標的影響依次是社會孤寂(Beta=-0.238)、工作穩定(Beta=0.219)、社會聯繫(Beta=0.160)及無家程度(Beta=-0.192)。可見，透過改善精神健康，亦可以改善其他四項指標。所以，精神健康擔任各項因素的中介結連角色，可構成在服務中最後的量度產出指標(outcome indicator)。

除了與精神健康與其他四項指數有互為影響外，其他指數相互之間的影響並不強，顯示有關指標能反映露宿者不同向度的狀況。其中唯一例外的是社會孤寂與社會聯繫呈重要及反面的相互影響，社會孤寂對社會聯繫的影響力 Beta=-0.469,而社會聯繫影響社會孤寂影響力 Beta=-0.449。兩者雙互的影響力均較精神健康為大，我們在上文經已指出社會聯繫指數反映著個案客觀的社會網絡，而社會孤寂則反映個案的主觀情緒。而社會聯繫多是反映社交網絡的大小和接觸頻繁程度，而社會孤寂則多反映社交互動中的質量。社交的質量和數量當然有一定的相互影響，沒有一定量的社交網絡(親友及鄰舍)，受助人當然較難找到較知心的朋友，而反過來說若受助人能找到較知心的朋友，藉著這些較知心朋友的介紹,亦可以進一步擴大其社交圈子及鼓勵其作更頻密的接觸。所以社會聯繫與社會孤寂會有互為影響的關係。

圖 3.5 接受上樓服務六個月後各指數關係



上樓六個月後各指標之間關係的變化

在接受上樓服務六個月後，社會孤寂、社會聯繫、無家程度及工作穩定指數依然與精神健康有明顯關係，(p<0.05)。社會孤寂與社會聯繫關係依然明顯(p<0.05)，社會孤寂與無家程度關係亦呈明顯兩者亦互為影響(P<0.01)。

相比接受上樓服務後六個月與初接受服務兩個不同時段，各量度指標的關係出現變化有兩方面。首先要是接受服務者的「無家程度」與「社會孤寂」有沒有影響變為有相互影響。其次

是「工作穩定」取代「社會孤寂」成為影響精神健康最重要的因素。

「無家程度」與「社會孤寂」

在接受上樓服務六個月後，對於無家程度的變化，社會孤寂的解釋能力有兩成(Beta=0.20)，而相反方向，無家程度對社會孤寂變化的解釋能力亦接近兩成(Beta=0.189)，但在初接受服務時，兩者的影響力並不明顯。這顯示接受服務的前露宿者在上樓後，若回到居所只是「面對四面牆壁」，而缺乏其他人的關心，這一方面會加強其影響孤寂感，而另一方面亦會強化其無家程度。兩者之間亦互相強化，我們認為要在上樓後留意為前露宿者建立較親密的網絡，令其獲得適當的關懷及互動，這才能減低其社會孤寂感及無家程度。

「工作穩定」成為影響精神健康最重要的因素

在初接受服務時對精神健康影響依次是社會孤寂(Beta=-0.274)、社會聯繫(Beta=0.177) 工作穩定(Beta=0.174)及無家程度(Beta=-0.151)。但在上數後六個月，不同因素對精神健康的影響力有所轉變，依次是工作穩定(Beta=0.365)、社會聯繫(Beta=0.225)、社會孤寂(Beta=-0.179)、及無家程度(Beta=-0.178)。

可見，在上樓後六個月，「工作穩定」取代了「社會孤寂」成為影響精神健康最重要的因素，其影響力更高達 0.365，能解釋精神健康三成半的變化，明顯高於其他三項因素。這顯示上樓後六個月，受助人經已較為適應上樓後的環境及生活，所以社會孤寂對精神健康的影響力大幅下降(由-0.274 下降至-0.179)，影響力由第一位下降至第三位。

反之，由於受助人在上樓後的工作穩定性會影響其長期經濟狀況，加上工作是否穩定會影響社會網絡的大小，以及影響受助人自尊感及自我效能，所以對其精神健康的影響愈來愈重要(由 0.174 上升至 0.273)，影響力由第三位上升至第一位。我們相信個案在得以穩定就業，其精神健康便會好轉；這亦意味著個案一旦失業，又無其他支援，會令精神健康大幅下降，其他指數亦受影響連帶。

從不同階段的指數變化，若長期失業，社會孤寂對精神健康的影響力最大；若在能有穩定的居所並且有穩定的就業對露宿者(絕大多數是男性)精神健康有正面的影響，穩定的就業本身可以減低社會孤寂感，兩者均對露宿者的精神有直接的影響。

3. 質性研究:尊嚴的失落

去工業化造成的邊緣困局

J 先生(個案 12, 男, 46 歲, 看更)

做包頭的好日子

J 先生在 1974 年由台山偷渡來港, 當時他只有 20 多歲。1979 年, 他開始學鑼床、做錶殼。學滿師後在同一間錶殼廠做了四年。他形容:「當時的錶殼廠像米舖那麼多, 一座工業大廈有十多間錶殼廠, 主要在大角咀、長沙灣、觀塘、土瓜灣、荃灣、葵涌, 不愁沒有工作。」

1983 年, 他轉去另一間廠做師傅, 當起小包頭來。他聘請了兩位工人, 每人日薪 170 元, 支付兩位工人的工資後, 每月仍可賺取 9000 元。這份工作, 做了四年多。

期間 J 先生曾想過開廠。他說, 只要三、四萬買台鑼床就可接單, 以前不少同行都由技工轉為小老闆, 這種情況很普遍。但 1987 年工序開始北移, 他沒有信心接到足夠訂單, 終於打消了開廠的念頭。

技術貶值 終無奈轉業

他又去了葵涌一間錶廠繼續做技工。1989 年, 該廠工序開始北移, 工作量及收入日漸減少, 有時只返半天, 或是返兩天休一天, 收入滑落到每月只有三千多元, 維持了半年「吊鹽水」的狀態, 他終於忍受不了而自動離職。

1990 年至 1995 年期間, 他相繼做過小販、燙衫、地盤散工, 但都適應不來; 高勞動強度的地盤工作, 對他來說尤其辛苦, 他勉強・了一年便捱不下去了。1995 年, 他開始失業。這段期間他曾經再回頭去找尋鐘錶工作, 希望舊有的技術仍有用武之地, 但不果。直到 2001 年 2 月, 他才找到一份看更工作, 但他對這份工作其實是非常嫌棄的。

J 先生過去的技術和能力, 曾令他爬升成為技工甚至小包頭, 當時的市場處境是相當不錯的。但去工業化令他們的技術市場價值不再, 他們要重新掌握新技術或轉行不易; 如 J 先生嘗試做地盤工, 但地盤工所需的技術及體力要求並不是一般勞工輕易能夠掌握和適應的。

J 先生亦不想放棄累積了二十多年的鐘錶生產技術, 他一直寄望能重新使用這辛苦

學成的本領。他失業五年只靠節衣縮食，最後做看更是「非不得已」的選擇，甚至覺得這個非技術工種是「七十二行中最低」，反映勞工看待自己的價值亦繫於其工作是否有技術。被迫降到服務業的長工時又無技術的工種，對勞工的信心和尊嚴有很大的打擊。J先生覺得他已經沒有翻身的機會，身處困局之中。

M先生(個案 30，男，53 歲，前廚房工人，現失業)

飲食業興旺 不愁工作

M先生 1967 年來港時一直在毛衫廠工作，1976 年朋友介紹入飲食業做廚房的「水檯」，負責·海鮮、解凍食物、準備材料給廚師等。當時他覺得人工與製造業差不多，但做飲食可以「包兩餐」，且行業很旺，不愁工作，所以入了行一直在飲食業做了二十多年。

從七十年代中至九十年初，他轉過很多酒樓，那裡人工高就轉工；有時是朋友介紹，或廚房部的阿頭帶著一班工友跳槽，老闆甚至會預支部分工資給新請的伙計，確保他們會返工，反映行內對工人需求非常殷切。

M先生表示自 1986 年起行內工人每年均獲加人工，由二百至五百不等，亦有雙糧，因那時本港消費力強，即使勞工階層如三行工人、或製造業工人收入亦不錯，願意消費在飲食方面；所以酒樓老闆願意加薪留人，90 年代初他可以有八、九千元的收入。

消費力減弱 酒樓倒閉難搵工

1995 年他在西環工作的酒樓因生意欠佳而倒閉，失業了半年，同行也是開工不足或失業。1996 年他找到一份快餐店的廚房工，工作十小時日薪 150 元，沒有假期每月只有 4000 多元收入，翌年這店亦捱不住終於結業了。

M曾去勞工處找廚房工，但有關空缺提出不合理的學歷要求：「要求中三程度、略懂英語」。二十多年的廚房工作經驗仍未能令他找到工作，加上年齡歧視，M唯有離開飲食業。他曾轉做運輸工人，但他的手因長期在廚房工作因而患上職業病，應付不了體力要求很高的搬運工作。他的新移民太太被迫接受只有 4000 多元的酒樓工作以維持一家四口的生活。最後，太太也失業，在 1999 年他們一家被迫要領取綜援。

M先生的個案顯示：八十年代飲食業的興旺曾為基層勞工帶來不錯的待遇(如加薪及改善員工福利)，令他們的市場處境不會很差，亦反映了當製造業及其他行業興旺時會加強工人消費意慾，間接帶動了消費零售行業的發展。但九十年代當基層工人收入銳減，消費意慾低，飲食業的不景氣下老闆只有減薪裁員、甚至結業。M先生即使擁有二

十多年的廚房工作經驗，仍不能令他脫離「邊緣困局」，他進而被迫脫離勞動市場，跌入綜援網之中。

建造業勞工議價能力被迫降低

七、八十年代香港的男性勞工除了當製造業及飲食業工人外，另外主要的出路是在建造業中工作。由於入行無須太高學歷，而勞工的回報著重從業員所掌握的技術水平及工種的勞動強度，所以不少低學歷水平的男性，可以透過學師成為中工，待掌握一定經驗便可成為「師傅」，亦即熟練技術工人，從事地盤或裝修的工作。而當時香港大型基建工程動工，公私營房屋的興建令建造業蓬勃發展。晉身為建造業「師傅」成為不少低下階層男性獲得較高報酬工作的主要途徑，不少父母亦認為學曉一門手藝，便足以旁身，可以終身受用，不用為生活發愁。加上建造業實行的多層承包制度令不少技術工人有機會成為「判頭」。在這些因素下，建造業成為了在製造業之外，男性工人成為小僱主的另一主要上升階梯。

但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建造業工人面對一連串的打擊，首先是機場工程輸入外地勞工，繼而是在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後，香港的泡沫經濟爆破，大量樓宇地盤停工，樓宇買賣下降亦令裝修的需求大減，所以令大量建造業工人開工不足。再加上，近年不少大陸持雙程證的人士來港後，到地盤當黑市勞工，其工資只及本地工人的三分一至二分之一，不單增加了建造業勞工供應，更重要的是降低了本地勞工的議價能力。

丙先生（個案 33，男，43 歲，地盤工人）

丙先生在八十年代曾當製造業工人及小廠主，後來又成為小販及再次成為製造業工人，但又再次面對工廠搬回大陸。最後在九五年間丙先生認為唯一的出路便是當建造業工人。

丙先生：「因為這是唯一一個行業不可以搬回大陸。我現時又無技術又無學識，我找到一般的工作當時只得五、六千元，但做三行加上補水，我每個月可賺到多過一萬元，所以我便轉去做地盤什工」

輸入外勞，打爛飯碗

但好景不常，丙又再次面對輸入外勞的打擊。興建機場輸入大量的外來勞工，雖然外來勞工的法定工資須相等於本地勞工工資的中位數。但現實是他們的工資只及本地工人的一半或更少，所以本地勞工不能獲得有關工作機會，而只能做些臨時的工作。

丙：「當時我只做了一段短時間，之後我便不能再找到長工，每月只能有幾日工開。機場外勞是最大的原因。他們又平，又可以大量輸入，又容易被控制。搞到我地無嘢好做，打爛飯碗。但由於無其他辦法，你只能夠有乜做乜。總之散工都做，開工做一單工程兩三日，再要等一兩個月才有得做。」

假如丙的情況只代表了那些沒有專門技術的地盤什工面對外勞被邊緣化的打擊，我們再看看以下兩個個案，均是建造業的技術工人，其市場處境及工作處境，亦與非技術的建造業勞工一樣惡劣。只是，他們又不甘心憑多年經驗所累積得來的技術突然變成沒有任何價值，未能接受沒有人願意購買他們的勞動力的現實。

己先生（個案 36，男，60 歲，油漆技工）

小判頭，生活安定

己先生年青時曾當海員，憑著經驗的累積，他最後曾升至水手長的職級。除了要管理其他水手外，己先生還在船上學會了各項三行的維修技術。在八十年代中，由於船公司開始聘請菲律賓及大陸的海員，他被公司遣散，唯有停止海員的生涯。上岸後，他便開始擔任油漆技工。在九七年前，己的工作雖然有起伏，但基本上，由於他是有技術的「師傅」，所以有一定的工資收入。加上他擁有管理經驗，所以不時有些朋友會叫他分包一些工程，成為小判頭。多年的工作令他有良好的人際網絡，不少朋友會互相介紹及分判工程。己先生說：「當時的生活基本安定，能夠養大三個子女供書教學，亦可以在旺角區買了一個舊式樓宇的單位。」

但自從九七年後，由於房地產市場每況愈下，工程愈來愈少，己先生的年紀亦已接近六十歲。就業情況急速惡化，開工愈來愈少。他在九九年間只接了一單長工程，工作了三個多月，但期後到二零零零年，差不多有十一個月完全沒有工開，每天只到旺角的公園等待，希望能等到一些散工的工作，但每天大多數是失望而回。

英雄無用武之地

己先生：「今年舊曆年到現在（二零零零年十一月），我一日工都無開過。打電話去搵老友，怎知大家的情況都一樣，個個都無工開。日日係屋企坐，食穀種。實在太悶亦沒有辦法，唯有下來公園坐，碰運氣，希望可以有人來叫開工。每天六點幾便到公園坐，下午又再來，但公園裏通常都有十幾二十人在等開工，就算有工開，都輪不到我們這些老嘢。」

當被問及會否考慮會轉行時，己先生反問說：「以我這樣的年齡，這樣的學歷，我還可以轉到那一行呢？做看更亦嫌我們年紀大，而且工作時間又長人工又低，我們假假地都叫做師傅，有一門手藝。體力上亦可以做得得到，但現在只時英雄無用武之地。」

感嘆「英雄無用武之地」顯示出己先生對所擁有技術的執著，並不是他個人的固執，而是大多數建造業技術工人的共同特徵。過去，建造業工人有強烈的行會傳統，當工會與商會訂出各工種的日工工資時，各工人及判頭都會主動跟隨，成為行規。而勞工有能力作集體議價訂出工資的基本依據是建造業工人所擁有的技術及經驗。喪失了有關技術，亦即意味著喪失了集體議價的基礎。工人便會成為「邊緣勞工」--陷入互相的惡性競爭，工資無底價的向下降。可以說，建造業勞工對技術的執著，是對要跌入邊緣困局的一種反抗(resistance)。

但面對生活的壓力，有時工人亦要被迫接受較低的日薪工資，以求找到收入的來源。經過九七年至九九年間長期失業，己先生在去年有朋友介紹他去做一份濾水廠的油漆工程。這份工不單要油漆，亦要指導其他新手工作，但日薪只有三百多元，只及行規所訂「一工」七百元的一半，但他也願意接受。

己解釋：「由於經已無工開一年多，生活壓力愈來愈大，有工開總算有收入，而且這合約接近三個多月，總算是份長工，所以三百多元亦照做。」

所以，對於那些年紀較大，議價能力較低的建造業工人，他們不得不接受較低的工資，而跌入貧窮勞工的邊緣困局。

像己先生超過六十歲，子女均已成長的建造業工人，由於家庭負擔較輕所以可以接受較低的工資來維持生活。但對於一些處於四、五十歲的建造業工人，他們的子女仍在就讀中學，他們更不願意轉行到低技術低工資的工作。他們更希望留在建造業中，發揮自己的熟悉的技術，亦不願意削減本身的工資。庚先生便是他們其中之一。

庚先生（個案 37，男，40 歲，釘板工人）

釘板工人，風光的日子

庚先生是熟練的釘板工人，在九七年前房地產高峰期，釘板工嚴重短缺，釘板工人的日薪曾高達一千二百至一千三百元，而且每月均可開足工，即有二十個工作天，所以每個月均有二萬至二萬五千元的收入。而且判頭們為吸引工人，會負責「茶、煙、酒」的開支，亦會支付午膳及下午茶，有些判頭甚至願意付出交通津貼。但九七年金融風暴後，房地產一落千丈，不少地盤停工，釘板工風光不再。庚先生在九八年起，便面對嚴重開工不足。每月只能開工兩至三天。

放下尊嚴，什麼工都做

由於開工機會愈來愈少，其他的工友亦沒有工開，庚先生認為在家裏等電話也不是辦法，唯有每天往旺角道建材舖的街角等待急需人手的判頭來聘請他做臨時的散工。庚先生說：「當然我想做釘板，但我有老婆、有子女要養。現在沒有辦法，唯有什麼都要做，地盤什工，倒泥頭，什麼都要做。以前做釘板搵千二三一工人，但現在做什工只有六百元一工都會做。問題是現在地盤中有很多雙程証的黑市勞工，他們二、三百一工都做，你點都無辦法同佢地爭。真係唔知特區政府做乜唔理，我每個月只得一兩日工開，你話點算？」

當被問及有否考慮轉行或參加再培訓時，庚先生說：「再培訓去讀什麼？去讀建造業其他的水喉、泥水，讀完也是無工開。做釘板經已是建造業行中又要有技術又要有氣力的，所以才有這樣高的人手。我又唔係沒有技術，我又唔係無氣無力，我點解要轉行？以我這樣的年紀和學歷可以轉去邊，做看更只得四、五千元，倒不如我繼續在這裏等，有十日工開都有六、七千元。」

我們回顧了製造業、服務業、及建造業各行業中的男性自八十年代至今的簡單的工作歷史。從各行業男性勞工的工作歷史均反映一個共同特點：過去男工因擁有技術、勞動力及工作經驗令他們面對資方時，有比較強的議價能力，部分勞工甚至有在社會階梯向上流動的機會，在勞動市場的處境並不太差。但八十年代中開始，製造業勞工因「去工業化」瓦解了他們過去具市場價值的技術、能力和勞動力的生存條件。訪談的個案反映製造業男工因其技術、管理能力，曾令他們在勞動市場處於較優勢的位置，在經濟轉型時他們極力保留技術，暫緩了轉行的壓力，但其技術亦最終被大陸勞工所替代，令其優勢不再，不得不跌入「邊緣困局」。而建造業工人在開工嚴重不足的情況下，亦要放下尊嚴，去尋找另外的工作。

失業勞工與在職貧窮的經驗

性別差異

筆者在 2005 年在深水埗區進行的研究發現性別差異在貧窮家庭中非常明顯。雖然，同為貧窮家庭，相較於婦女，失業男性則較難放下尊嚴和限制。從以下失業勞力及在職貧窮人士的經驗，不難發現，由於性別差異，而衍生對失業和貧窮的不同回應。鍾先生便是一名頗典型的男性中年失業者。

鍾先生，福建人，今年 46 歲，去年 7 月失業至今。與太太與 3 個子女同住在富昌村。太太做酒樓，月薪 5000 元。去年七月份鍾生的電鍍工廠因為北移大陸而失業，期間他在葵涌另一間電鍍廠工作，不過因為新工作需要他搬很重的貨品，所以他做了一個星期後就不幹了。他心目中最希望找到一份有八、九千元的工作。後來他就去應聘保安員，雖然獲聘但他卻感到受到歧視。鍾生自言自己很想找到工作，不過他又不甘心做一些只有四、五千元的工；目前一家依靠太太做酒樓五千多元的工資維持生計及以往的積蓄，但每月支付三千三百元的公屋租金始終是十分吃力的，所以最近向房署申請了減租。另一方面，他亦去了村內一間社會服務機構參加「深入就業援助計劃」的保安員培訓，20 小時的課程學費為 300 元，由該社福機構支付。他曾考慮申請綜援，不過由於家人的反對而未有申請。

能哥亦面對類似情況。能哥是冷氣技工，以下是他的經驗。

「同一個判頭，做左好耐，點知話我人工高過頭，炒左我地四個人，寧願用後生二百蚊一工，就唔用我們。都識到其他判頭，但你的人工係咁高，唔會用你啦。(問：有沒有想過要減人工?) 減唔得好多，通常一工五百；封喉一般係五百蚊，如果識開料就六百」

另一個案是梁家。梁家是新來港低收入家庭，一家三口住在深水埗一唐樓，月租 2500 元。梁氏夫婦兩人皆是新來港，丈夫 97 年來港，太太去年 8 月來港。梁生來港是為了照顧年老的父親，父親那時已不良於行。梁生在內地的教育院校唸歷史，曾做過數年的中學教師。因為內地學歷不被政府承認，所以來港後他來港一個月入了某間工廠做搬泥水工人，做了一個多月，期間認識了一同鄉，介紹他入行做什工，那時地盤什工日薪有四百八十元，於是開始他的工地生涯。梁生以往最穩定的是在 99 至 2001 年為一間建築公司打工，後來公司倒閉後就不斷遇上欠薪。過去數年，梁生一直被拖欠工資困擾，

不時與其他工友上勞工處、勞審處追討欠薪。不過，梁生卻鮮有找工會協助。梁生表示也想過轉行，亦有留意報紙的廣告，但不少工作都只有四、五千至五、六千元，他表示目前判頭找他開工，做焊工日薪有 500 至 550 元，平均每月有十五至十八天工作。目前有八、九個判頭可以介紹工作給他。

「咁耐我都係長散，邊個有工開就去邊，有時呢個無就打電話搵第二個。」

由上述失業勞工及在職貧窮人士的經歷可見，由於經濟轉型，這班低技術的勞工，面臨失業，開工不足，工資削減等遭遇，與婦女們不同。這班男性的貧窮人士，大部份都是香港居民，在香港住了一段頗長的日子，亦經歷了香港九十年代初期的繁榮，相較於新來港人仕，他們較熟識香港的情況，亦曾擁有由於工作而建立的人際網絡。但隨著經濟不景，失業，他們固有的人際網絡亦瓦解。雖然有部份人仕運用他們固有的人際網絡，獲得散工或不固定的工作。但大部份人士，他們固有的網絡亦隨工作的轉移和減少而轉趨薄弱，有關貧窮人士社會資本的弱化的詳細討論可參看黃洪(2004)及黃洪及李劍明(2001)。

性別的差異明顯反映在他們尋找工作的過程，在男性的論述中。雖然，他們有提到失業對家庭的影響，亦一直強調作為一家之主有責任要肩負養家的責任，但他們的解釋是，低工資的工作不足以養活家庭，所以會拒絕接受某些工作。而女性的解釋是，由於要工作養活家庭，所以低工資的工作亦要無奈接受。兩性的差異在這裏突顯一家庭負擔對女性來說，是推動他們進入勞工市場的動力。但在男性方面，卻成為他們拒絕進入低工資勞動市場的其中一個原因。

相較於女性，男性對工資的要求有較執著的堅持，受訪婦女中，不少婦女每月的工資是在 5000 元或以下。但對男性來說，他們較難放下尊嚴去接受一些他們認為較差的工作（例如看更）或者工資達不到接受水平的工作（例如月薪五千元的工作）。上述論述反映兩性角式的差異，傳統的觀念（男性需養家），或者亦是由於男性覺得自己仍有選擇（例如散工機會）及相較於女性，他們所擁有的資源亦較多（例如舊工友的網絡、小量積蓄）。當然，男性們由於在八、九十年代時，曾經歷香港的經濟起飛，令他們較難放下身段作出適應，亦是原因之一。

失去尊嚴和快樂

對於大部份低下階層男性，失去工作不單是令他們失去收入、失去生活的支柱，更令他們失去工作所帶來的尊嚴和快樂。當我們詢問被訪者人生不同階段中，最快樂是那一段時光，他們不約而同指出是他有全職工作，開足工與工友一起工作，一起娛樂的時候。

「唔憂無工開，一個月開足二十六日，星期日自己休息；娛樂下，玩晒，個時無點賭錢；成日同朋友一齊玩，卡啦 ok，好高興，一班人，而家少好多，大家都唔掂。

(明，水電散工)

「最開心係八十年代，個時係三行的高峰期；個個都有野做，二百八十元一工，物價又唔高，那時大陸剛開放，各行各業都好好，搵到錢。賺錢投資係馬會囉！好正常啦，十個工友九個都係賭下馬仔；有輸有贏，大家一齊收工去開下雀局，最開心有成十年。」

(蔡生，三行油漆工)

「七四至七五年剛出來做製衣廠熨衫，個時一班工友，亦有些是由細玩到大，放假會去釣魚；搵到錢，又會去搵骨，正經呀；平時都會同工友組一隊波，會去踢波，又搵到錢，..性格大家合得來，有時燒野食，去下旅行；朱維德介紹去旅行，大家鍾意去玩，十幾歲玩到三十幾歲...」 (盧生，目前失業、曾做菜欄)

提到有工作的一段日子，他們都表現興奮，對大部份受訪者來說，有工開有收入是他們最希望達到的基本需求。而由於工作所帶來的成就感和尊嚴，令他們覺得開心。

小結

對男性來說，雖然家庭並未能成為推動男仕們工作的主要動力，但「一家之主」及「養家」的傳統觀念，在男性勞工的心目中，仍非常牢固。工作對貧窮人仕非常重要。對他們來說，工作並非單是收入，更重要是能增廣見識，覺得自己有用，對很多人來說，工作亦是他們建立人際網絡的主要橋樑，工作對貧窮人士及家庭的價值是不容置疑的。對男性來說，工作的重要性更明顯，這是他們用來衡量自己「是否有用」，是否「一家之主」的標準，亦是他們用作維繫人際網絡的途徑。

總結

本文綜合筆者近年有關香港貧窮人士的多項研究，集中分析男性貧窮人士的處境。在香港貧窮線研究的研究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男性勞工在工友網絡解體的情況下，社會資本的數量減少，同質化的情況亦愈來愈嚴重，貧窮男性朋輩的失落一方面與他們貧窮及被排斥的處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令他們處於困局。

在露宿者服務的評估研究中，我們則了解到露宿者——長期貧窮男性——面對長期朋輩的失落的情況後，會出現社會孤寂的情況。但我們發現影響露宿者精神健康並不是單一因素，而是多項因素均有影響，其中在接受服務初期以受助人社會孤寂的影響最大，佔精神健康的變化差不多三成，而其他社會聯繫、工作穩定、及無家程度三項因素的影響力則相若。

社會孤寂與社會聯繫呈重要及反面的相互影響。社會聯繫指數反映著個案客觀的社會網絡，而社會孤寂則反映個案的主觀情緒。而社會聯繫多是反映社交網絡的大小和接觸頻繁程度，而社會孤寂則多反映社交互動中的質量。社交的質量和數量當然有一定的相互影響，沒有一定量的社交網絡(親友及鄰舍)，受助人當然較難找到較知心的朋友，而反過來說若受助人能找到較知心的朋友，藉著這些較知心朋友的介紹，亦可以進一步擴大其社交圈子及鼓勵其作更頻密的接觸。所以社會聯繫與社會孤寂會有互為影響的關係。

但在上樓後六個月，不同因素對精神健康的影響力有所轉變，依次是工作穩定、社會聯繫、社會孤寂、及無家程度。可見，在上樓後六個月，「工作穩定」取代了「社會孤寂」成為影響精神健康最重要的因素，能解釋精神健康三成半的變化，明顯高於其他三項因素。這顯示上樓後六個月，受助人經已較為適應上樓後的環境及生活，所以社會孤寂對精神健康的影響力大幅下降，影響力由第一位下降至第三位。由此可見，工作穩定可以為貧窮的男性帶來精神健康重要的轉變。

此外，根據不同的質性研究，我們知道貧窮人口中的中年男性多是以前從事製造業及建造業的工作，面對經濟轉型，他們不但面對失業減薪的經濟困境，更要被迫降到服務業的長工時又無技術的工種，由於不少男性勞工看待自己的價值源於其工作是否有技

術，所以這個去技術化(deskilling)的過程，對勞工的信心和尊嚴有很大的打擊。令他們覺得沒有翻身的機會，身處困局之中。而不少技術建造業工人更不甘心憑多年經驗所累積得來的技術突然變成沒有任何價值，未能接受沒有人願意購買他們的勞動力的現實，而變成長期失業或開工不足的勞工，感嘆「英雄無用武之地」。

性別的差異明顯反映在他們尋找工作的過程，在男性的論述中。雖然，他們有提到失業對家庭的影響，亦一直強調作為一家之主有責任要肩負養家的責任，但他們的解釋是，低工資的工作不足以養活家庭，所以會拒絕接受某些工作。而女性的解釋是，由於要工作養活家庭，所以低工資的工作亦要無奈接受。兩性的差異在這裏突顯一家庭負擔對女性來說，是推動他們進入勞工市場的動力。但在男性方面，卻成為他們拒絕進入低工資勞動市場的其中一個原因。

相較於女性，男性對工資的要求有較執著的堅持，受訪婦女中，現時不少婦女每月的工資是在 5000 元或以下。但對男性來說，他們較難放下尊嚴去接受一些他們認為較差的工作（例如看更）或者工資達不到接受水平的工作（例如月薪五千元的工作）。上述論述反映兩性角式的差異，傳統的觀念（男性需要養家），或者亦是由於男性覺得自己仍有選擇（例如散工機會）及相較於女性，他們所擁有的資源亦較多（例如舊工友的網絡、小量積蓄）。當然，男性們由於在八、九十年代時，曾經歷香港的經濟起飛，令他們較難放下身段作出適應，亦是原因之一。

對於大部份低下階層男性，失去工作不單是令他們失去收入、失去生活的支柱，更令他們失去工作所帶來的尊嚴和快樂。

參考資料

英文參考資料

- Coleman, J. 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95-120.
- Flap, H. D. (1999). Creation and Returns of Social Capital: A New Research Program. *La Revue Tocqueville*, XX(1), 5-26.
- Granovetter, M. (1981) "Toward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Income Differences" in I. Berg (e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Labor Market*, Academic Press, pp.11-47.
- Putnam, R.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utnam, R.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Rankin, B. H. & Quane, J. M. (2000). Neighborhood Poverty and the Social Isolation of Inner-city African American Families. *Social Forces*, 79(1), 139-164.
- Saegert, S. , Thompson, J.P. , Warren, M.R. .(eds.) (2001). *Social Capital and Poor Communitie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Sherraden, M.S. and Nimacs, W.A. (eds.)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Work*. Binghamton, NY: The Haworth Press.
- Wilson, W.J.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中文參考資料

- 政府統計處 (2001)。二零零一年人口普查簡要報告。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
- 黃洪及李劍明 (2001)。困局、排斥與出路：香港「邊緣勞工」質性研究。香港：樂施會。
- 黃洪及蔡海偉(1996)。香港低開支住戶開支模式研究。香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及樂施會。
- 黃洪及蔡海偉(1998)。終止及重新領取綜援研究。香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及樂施會。

<全文完>

-
- ¹ 本文的數據源自我與城市大學社會科學部李劍明先生所進行的「香港貧窮線研究：跨學科的分析」，有關研究獲香港研究資助局的「角逐撥款資助」(編號: CityU 1184/99H) 資助，才能順利進行，謹此致謝。
- ² 政府統計處: 《二零零一年人口普查簡要報告》。(香港: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 2001)。
- ³ R. D.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⁴ R. D. Putnam,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 ⁵ Coleman, J. 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4, (1988), pp.95-120.
- ⁶ Wilson, W.J.: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⁷ Rankin, B. H. & Quane, J. M., "Neighborhood Poverty and the Social Isolation of Inner-city African American Families," *Social Forces*, Vol. 79, No.1, (2000), pp.139-164